

「玩完」的是傲慢舊框架 豈能刻舟求劍看香港？



林偉全

議會內外

近年，不時有美國政客或評論員發文稱「香港玩完」，甚至以一種俯瞰式的口吻，宣稱「舊香港已經終結」。作為一個90年代在基層打工、後來創業，到今天有幸在議會為商界發聲的企業家，看到這些論調，我不禁要反問：他們懷念的，究竟是一個怎樣的「舊香港」？

對我們這些真正經歷過那個年代的港商來說，舊時代的告別絕非香港的衰落，而是實現多元自主與真正公平競爭的開始。

這些人之所以誤判香港的變遷，是因為他們的思維仍死守着幾十年前的舊框架，習慣將香港視為一個單純的中轉站。回想90年代初，港英統治下的商業環境遠非某些人幻想中的公平天堂。當時的某些商業話語權牢牢掌握在西方企業手中，本地與內地企業哪怕再勤奮，也常充當廉價代工的角色，面臨無理壓價與退貨。

我至今依然清晰記得90年代初的一幕。

我當時是一名跟單採購員，一位外國買家來到我貿易公司的辦公室，閒聊間我談及內地製造業的崛起與潛力，他卻不以為然地笑說：「沒有用的。你看這間辦公室八成東西都是中國製造，但你做的是什麼？沙發、桌子、計算機。而最貴的電腦、手機、call機，全是西方技術。所以你們做再多生產也沒用，因為最高端的利潤永遠是我們做。」

西方主導時代沒落的悲鳴

然而，時代早已翻篇。
回歸以來，隨着國家科技與高端製造業的飛躍發展，產業鏈補齊了技術缺口。香港貿易與製造企業不再只是被動承接外判訂單，而是主動結合科學園、數碼港及本地頂尖高校的研發成果，轉型為高附加值的技術整合者與供應鏈管理中心。香港企業不再局限於底層代工，我們的貿易公司與本土企業有能力涉足高科技領域。

最近有人拿香港IPO集資額大多來自

內地龍頭企業，來質疑香港失去國際性，似乎在他們的舊視野裏，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必須像過去一樣，永遠扮演轉手站才算國際化；他們把「為中國最具競爭力的硬科技與製造業巨頭融資」解讀為弱點，無視了今天的內地和香港企業，早已具備全球領先的技術實力與市場份額，更積累了不容忽視的軟實力。

對於「香港不再像以前那樣國際化」的質疑，討論這個問題前，我們要先理清清楚：什麼是「國際化」？正如紐約、東京等全球頂級大都市一樣，一個城市的生命力恰恰體現在它能否隨時代演進。如果三十年如一日墨守成規，那才是真正的衰退。

面對全球地緣政治與經濟格局的重塑，香港商界展現了強大的韌性：我們不再把雞蛋放在傳統的單一籃子裏，而是主動開拓「一帶一路」、東南亞及廣闊的內地市場。我們的企業家飛往利雅德、杜拜、曼谷談合資，反向輸出標準與技術。特首主動率領代表團出訪中亞國家哈薩克斯坦和

烏茲別克斯坦。香港給自己的角色，不再是資本進出亞洲的單向通道，而是連接全球新興市場的雙向樞紐。

上半年香港實質GDP增長5.1%勝預期，財政司司長更上調全年經濟增長預測。我們必須強調的是，香港市場布局的多元化，絕不等同於對傳統歐美市場的疏遠。恰恰相反，我們與英國、德國、意大利等歐洲夥伴的經貿關係仍在穩步深化。僅以英資為例，滙豐、怡和、太古等百年企業在港持續擴展業務，正是對香港營商環境投下的信心一票。

未來在敢拚敢創的港人手中

同樣，香港與德國的貿易額持續增長，與意大利在時尚、設計及高端製造領域的合作亦從未間斷。香港的大門，對所有尊重市場規則的商業夥伴永遠敞開。那些抱怨香港「變了」的人，只是因為香港不再按照他們設定的舊劇本運轉。
這些人試圖將內地企業在香港的集資、

中央對香港的政策支持塑造為一種貶義的標籤，恰恰暴露了其對「國際化」認知的狹隘。真正的國際化，從來不是盲目崇拜某一種語言或某個單一市場，而是廣納百川。如果因為一座城市多了幾種語言、多了幾個方向的航班，就斷言其「終結」，那這種論述本身，就是對「全球化」一詞最大的誤解。無論在辦公室裏講的是廣東話、普通話、英語還是阿拉伯語，只要大家能在這裏共享公平的法治環境、做成跨境生意、共同制定產業標準，這就是最高規格的國際化。

「舊香港已經終結」這句話，某程度上並沒有說錯——那個受制於人、被動依附、任人定義的「舊香港」，確實已經正式終結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擺脫了偏見與壟斷、市場布局更加靈活抗風險的「新香港」。香港的未來與繁榮，從不由某些學者與評論員的筆下決定，而在每一個靈活變通、敢拚敢創的香港人手中。
立法會議員商界（一）

解決充電痛點 助推的士業界綠色轉型



陳克勤

議事廳

截至今年7月，香港的士車隊獲政府發牌已滿一年，但車隊整體規模僅達到預期目標的57%，發展步伐未如理想。運營商反映「充電設備不足與補能效率低下」是制約車隊規模發展的其中一個原因。

該觀點存在一定合理性。傳統石油氣的士加氣只需2至3分鐘，但電動的士在找充電樁連同充電的過程，每次至少需耗費40至70分鐘，除充電收費外，有時還要額外支付20至35元停車場費。這不僅縮短了司機接客的時間，更會每次帶來逾百港元的營業損失，令不少司機望而卻步。

近年來，有關部門推動「香港電動車普及化」及綠色運輸轉型上的成果有目共睹。環境局推動了多項支援措施，目前已鋪設12支電動的士專用高速快充樁，並將推動約60個加油站提供近180支高速充電槍，預計可支援一萬輛電動車。目前已經有三個油電站開始營運，部分充電樁在3時至6時一般「交更」時段專為電動的士和公共小巴預留，且設置充電收費上限，切實降低用電成本。總體來看，目前香港已有超過17300支公共充電樁，高速充電樁達3390支，可支援超8萬輛電動車。

善用市場機制引導錯峰充電

但從商業營運的現實角度考量，問題不在於充電樁絕對數量的多寡，而是在於能否提供「低成本、高流轉、易觸達」的專屬配套，幫助的士司機在激烈競爭、時間寶貴的市場中，無後顧之憂地轉型升級。若相關部門能在電價優惠、專用戶保障等環節上持續提升，相信定能給予業界更大信心。因此，長遠來看，建議可採取以下方案解決電動的士的充電痛點：

在專用基建尚未完工的過渡時期，應善用市場機制引導車輛錯峰充電，提升現有充電設施的承載力。建議相關部門倡導兩大電力公司針對已登記的電動的士推出專屬充電優惠，在非「交更」時段提供商業專用折扣電價；亦可鼓勵商業充電運營商實施差異化定價，降低非繁忙時間用電成本，提高現有充電樁的利用率，緩解充電高峰期排隊壓力。

長遠來看，建立專用且高效的快速充電網絡，才是治本之策，這也同政府規劃方向一致。目前，有關部門正推動加油站加裝充電樁，並在高峰時段對電動的士設置專屬車位。其實，亦可以善用九巴、城巴等專營巴士車廠日間空置充電設施，在巴士非繁忙時段開放給予電動的士充電，提升資源利用效率。也可以善用天橋底空間、高架橋下土地以及交通樞紐旁的邊角地建設高速充電樁，在不佔用稀缺商業土地的前提下增加專用快充節點，打造綜合快充網絡。

可引入「換電模式」試點

現時不少內地城市正廣泛採用「換電模式」，司機將車輛開入換電站後，工人為其更換滿電電池，過程僅需2至3分鐘。然而該模式高度依賴標準化，要求電動車、電池型號統一；加上換電站佔地面積較大，在市區內會產生高昂的地租成本，因此很難作為主流補能模式在香港推廣。然而，可以考慮將其作為一種補充手段，在新界或遠郊建立試點，為特定車隊提供極速補能。

推動的士電動化不僅是公共交通升級的關鍵，更是香港減碳重要戰略選擇。在轉型過程中，如何構建「低成本、高流轉、易觸達」的充電模式，是推動行業發展的關鍵所在。期待政府繼續發揮引導作用，降低充電成本，搭建快充網絡，並積極探索更多創新手段，為新能源交通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綠色動能。

民建聯主席、立法會議員

日本在核問題上玩弄文字遊戲



李穎彰

看世界

2026年8月9日的長崎，本應是日本政治人物直面歷史傷痛、展現真誠反省的莊嚴時刻。上世紀，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最終將災難引向日本本土，也給亞洲各國人民帶來了罄竹難書的苦難。長崎和平祈念儀式，從來不是日本政府洗白歷史、表演和平的例行公事，而是檢驗日本是否真正汲取教訓、堅守和平道路的試金石。在任首相在此說出的每一句話，不僅原爆倖存者與死難者家屬在聽，飽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亞洲鄰國人民，同樣在以最嚴肅、最警覺的心情加以解讀。正因如此，高市早苗在儀式上對日本「非核三原則」的含糊表述，理所當然激起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的高度警惕。

企圖修改「非核三原則」

「非核三原則」即不擁有、不製造、不引進核武器，是日本在戰後向國際社會作出的鄭重承諾，也是支撐日本和平憲法的重要基石之一。戰敗後歷任首相皆以明確語言重申堅守這一原則，但高市卻僅止於強調日本「目前」遵守，刻意迴避對未來作出清楚承諾。必須指出，外交措辭從來不是中性的，時態的選擇、修辭的輕重與刻意的省略，恰恰暴露了日本右翼政府最真實、最危險的政策意圖，為未來修改「非核三原則」預留灰色地帶。

高市若真心堅守和平承諾，理應在儀式後立刻公開重申日本將永久堅持「非核三原則」，並明確排除任何政策倒退的可能。然而，她選擇了「沉默」。在長崎這個本應用苦難記憶呼喚和平的城市，首相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種挑釁性的政治信號。這不禁讓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嚴正追問：日本政府是否正處心積慮，為未來發展核武器、突破和平憲法束縛

鋪路？這種刻意保留的語言空間，正是日本右翼長期以來推動「國家正常化」、謀求軍事鬆綁的一貫伎倆。

更值得國際社會高度警惕的，是高市的曖昧措辭，與日本右翼勢力近年來變本加厲的安全論述完全合流。部分日本保守政客與輿論正大張旗鼓地鼓吹核共享、核威懾，企圖突破專守防衛、擴充軍備包裝成所謂「現實需要」。他們慣用的藉口，是渲染所謂「中國威脅」與區域安全環境變化。然而，對於曾經遭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佔領、殖民壓迫的中國及亞洲各國而言，這類說法絕非抽象的戰略辯論。日本當年對中國發動全面侵略戰爭，製造南京大屠殺、推行「三光政策」、強徵慰安婦，進行滅絕人性的細菌戰與人體實驗。右翼勢力非但沒有真誠道歉，反而參拜靖國神社、篡改歷史教科書、否認侵略罪行。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日本在核武及軍事擴張問題上的任何曖昧，都只會被亞洲國家理解為軍國主義陰魂不散，必須予以最堅決的反制。

這事態更觸及戰後國際秩序與日本和平憲法的根本性原則。日本和平憲法的核心在於徹底否定軍國主義，嚴格限制國家軍事權力，防止日本重走侵略擴張老路。「非核三原則」正是這套戰後約束機制的關鍵支柱。若日本右翼政府將之降格為可隨意調整的政策工具，而非對國民及國際社會的莊嚴承諾，則和平憲法形同虛設，軍國主義復辟的法制障礙將被進一步拆除。這絕非單純的措辭疏漏，而是關乎日本國家道路選擇與亞太和平穩定的根本性抉擇。

從區域安全角度看，後果同樣極其嚴重。中國、朝鮮半島及東南亞各國絕不可能將日本在核政策上的曖昧視為單純內政。這一系列舉動，只會被國際社會解讀為日本右翼勢力全面抬頭、修正主義日益猖獗、軍事政策加速轉向

的連鎖信號。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繁榮，長期依賴各國對歷史教訓的共同銘記、外交上的相互克制，以及對日本和平承諾的基本信任。當高市政府在校問題上刻意釋放模糊信號，這份本就脆弱的信任便會遭到進一步破壞，迫使區域國家提高安全警戒，令本就複雜的地緣政治局勢雪上加霜。

對戰爭受害者的二次傷害

最令人無法容忍的，是這種政治操弄對原爆倖存者以及所有戰爭受害者的公然傷害。廣島與長崎的原爆倖存者，不應被任何政治勢力綁架利用。他們的苦難經歷，本應促使人類徹底摒棄戰爭與核武器。高市站在他們面前，卻拒絕明確承諾日本將繼續無條件拒絕核武器，這不僅是語言上的背叛，更是對戰爭與核災難受害者的二次傷害。中國人民對此感同身受，因為我們同樣是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戰爭的巨大受害者。任何企圖美化侵略歷史、淡化戰爭罪行、架空和平承諾的行為，中國人民都絕不答應。

歷史早已證明，一個在核克制與和平承諾問題上玩弄文字、偷換概念的日本，不僅不會因此變得「強大」，只會變得更加危險與不可信任。對日本而言，真正的安全保障絕不可能建立在模糊承諾、擴軍備戰與迎合右翼民粹之上，而必須真正扎根於對侵略歷史的徹底反省、對和平憲法的嚴格遵守、對區域互信的實際維護。長崎的記憶應當警示世人：軍國主義帶來的從來不是榮耀，而只會是徹底的毀滅。任何企圖鬆動戰後和平約束、為軍備擴張開綠燈的行徑，不僅是對日本自身和平承諾的背棄，更是對亞太地區來之不易的和平與繁榮根基的嚴重損害。中國將與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一道，對此保持最高級別的警惕。

執業律師

從深圳 APEC 峰會看香港盛事機遇



李江勝

議論風生

2026年11月，第33屆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非正式領導人會議將於深圳舉行。這是中國第三次主辦APEC峰會，也是亞太地區層級最高、領域最廣、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合作機制，首次將主會場設於粵港澳大灣區。今年APEC會議以「建設亞太共同體」為主題，核心議題聚焦於「開放、創新與合作」。儘管峰會在深圳舉行，但其輻射範圍及經濟腹地，實際涵蓋了包括廣東、香港和澳門在內的整個大灣區城市群。面對來自21個經濟體的參與者與利益相關方，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和國家對外開放的橋頭堡，該如何利用這類盛會帶來的機遇，值得認真思考。

主動策劃承辦分論壇

展望2026年APEC峰會可能深入探討的前沿議題，從貿易與投資便利化、全球供應鏈重組，到跨境支付體系互联互通、綠色金融與能源轉型，再到數字經濟以及

大規模人工智能（AI）的商業化應用等等，這些領域不僅是亞太乃至全球經濟增長的新引擎，也契合了香港近年來全力推進的核心產業方向。

香港長期扮演的「超級聯繫人」角色，正是內地企業走向全球，也是國際資本流入中國的雙向樞紐。香港有成熟的專業服務體系，具備國際公信力的法律仲裁機制，以及高度發達的資產與財富管理生態，完全有條件成為峰會期間及會後跨境商務談判，重大投資配對和跨境商業爭端解決的首選平台，將在APEC舞台上大放異彩，這是深圳難以取代的角色，也是香港把握此類機遇的核心優勢。

如果香港只是被動地等待APEC峰會這類國際盛事產生的溢出效應，那麼其能爭取到的空間將相當有限。真正有意義的參與，需要香港主動出擊。具體來說，有三個方向值得優先考慮。

第一，深化與深圳及大灣區其他城市的協調機制。回顧歷屆APEC峰會，商務諮詢會議和高級別官員會議等相關安排先後

在廣州、上海、大連等地舉行。其實香港完全有能力舉辦多場高級別與峰會有關的活動，而不是僅限於APEC財政部長會議。例如，香港可主動策劃並承辦聚焦「綠色金融」「跨境資產管理」或「專業服務互認」等分論壇。透過這種聯動模式，讓各國代表在參會之餘，能親身走一趟香港，體驗大灣區內另一種國際化的制度環境，這遠比事後單向宣傳推廣更具說服力。

第二，將盛事窗口轉化為拓展業務的實際機會。香港應敏銳捕捉APEC等國際會議對人工智能、量子技術商業化以及關鍵產業鏈供應鏈等議題的關注，主動對接亞太地區相關領域的投融资需求，鼓勵並吸引更多優質企業來港上市，設立區域總部，使用香港的仲裁與法律服務。這需要香港的金融監管機構、交易所及行業協會提前備妥具體的合作方案，而不是等峰會開幕才臨時展開宣傳。

第三，借助峰會的政治動能，推動與深圳的規則對接。客觀來講，粵港之間在

專業資格互認、跨境數據流通、海關通關便利等方面，長期存在制度差異。APEC峰會這樣的高規格會議，通常會促使東道國加快與國際標準接軌，如在簽證便利化和商務旅行卡互認等方面樹立新標杆。香港應努力爭取將這些便利安排延伸到自身，並藉機推動前海、河套等平台的規則對接，把「一國兩制」下的制度靈活性，轉化為看得見的成效。

做好「二軌外交」積攢話語權

APEC等國際會議從來不只是官方對話場合。雖然峰會將匯聚來自各經濟體的政治領袖和商界代表，然而智庫、商會與學術界之間的交流，往往是真正解決問題的前奏。在複雜多變的國際政治與經貿環境中，香港作為一個單獨關稅區且高度國際化的城市，它具備其他城市都難以複製的溝通空間，熟悉內地的政策邏輯，也了解國際夥伴的關切與願處。

香港的大學、商會及專業團體，完全

可以在峰會前後，自行組織或聯合舉辦一系列學術研討會、閉門對話會及企業交流活動，把可能因外交辭令而難以跨越的分歧，放到相對非正式、專業導向的場合去討論。這種「二軌外交」做得好，其效果會立竿見影，不會在峰會結束後很長一段時間才顯現出來。它還能實實在在地減少誤解、緩和摩擦，讓香港在國際事務中積攢更多的話語權，而不僅僅是峰會舉辦地點的配角。

未來，從亞太經濟體來看中國的發展，深圳代表的是中國科技創新的高地和引擎，而香港則是連接內地與世界的制度橋樑，兩者本質上是互補的，而非只是競爭關係。峰會在深圳舉行，香港一樣可以分享到大灣區一體化帶來的紅利。香港需要做的是主動謀局，積極參與，把握好峰會契機，讓國際盛事帶給香港的不只是幾天的高光時刻，而是檢視自身國際角色，加快制度開放步伐，為香港提供持續發展的動能。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